阿美士德使团日志中的扬州印象

——兼与《马可波罗行记》中的扬州印象比较

王 婷 雍正江

[摘 要] 从西方现代社会的观察者出发,以工业革命以来快速发展的英国为参照,阿美士德使团对清代发达地区——扬州的印象基调是灰暗的,从中可以管窥阿美士德使团成员的中国观:古老的中国文明已处于停滞和衰落状态。从中世纪欧洲商业社会的观察者出发,以商业社会的威尼斯为参照,马可·波罗扬州印象的基调是亮丽的,由此可以管窥马可·波罗的中国观:中国文明处于较快发展的状态。受时代、国情和个人经历的影响,阿美士德使团对清代中国的贬损、马可·波罗对元代中国的溢美未必等于客观事实本身,但不同的中国观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阿美士德使团;马可·波罗;扬州印象;中国观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873(2023)05-0089-08

[作者简介] 王婷,扬州大学档案馆馆员;雍正江,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225009

1793 年来华的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团在热河觐见了乾隆皇帝。1816 年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使团再次来华,8 月 29 日抵达北京,却未能觐见嘉庆皇帝,当天便被皇帝打发离京去广州。此次出使的彻底失败使阿美士德使团对中国的批评和贬低胜于马戛尔尼使团。阿美士德使团在扬州境内停留了 12 天(1816 年 10 月 8 日至 20 日)。相关日志对宝应、高邮、扬州城、瓜洲、仪征等地多有记载。阿美士德使团成员副使亨利·埃利斯(Henry Ellis)和首席医官、博物学家克拉克·阿裨尔(Clarke Abel)的旅行日志记录了沿途所见所闻,最终形成了《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①和《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Narrative of a Journey in the Interior of China and of a Voyage to and from That Country, in the Years 1816—1817)两书。^②

在阿美士德使团到达中国的五百多年之前,意大利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于1271年抵达中国,得到忽必烈的重用,大约1282—1284年在扬州任职。[®]《马可波罗行记》记载了宝应、高邮、扬州、瓜洲、真州(仪征)等地的城市建设、工商业和宗教信仰等。

马戛尔尼使团对中国的评价很低,而阿美士德使团对中国的评价进一步降低。《马可波罗行记》对中国的评价则很高,自1298年问世以来,几乎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唯一渠道"。[®]本文主要依据上述三部使华旅行记和日志,对阿美士德使团和马可·波罗眼中的扬州风貌进行比较分析。

①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刘天路、刘甜甜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

② 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 刘海岩译, 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③ 马可·波罗是否在扬州为官,成为肯定与怀疑"马可·波罗到中国"的一个重要议题。一些文史工作者在万历《扬州府志》和康熙《扬州府志》中找到了马可·波罗扬州为官的史实,使长期困惑人们的这一疑虑得到诠释。参见余志群:《马可·波罗行迹扬州方志考》,《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2 期。

④ 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史卫民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471页。

一 有关工商业和城镇的描述

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时英国的工业革命深入展开,城市建设突飞猛进。一方面,城市数量快速增加,"许多工厂城市,就像是用了法术一样,一下子就从地下变出来了";[©]另一方面,城市景观不断更新。1795年前后几年里,曼彻斯特新建的街道几近该城的两倍大小,[©]道路两旁的市民建筑也得到了许多重大改善。[®]时人朗福德评价伯明翰:"6个月的时间内曾访问过(伯明翰)的旅行者觉得他自己对她很熟悉,然而在春天放马吃草的地方,秋天可能就会碰到满大街的房屋。"[®]有人认为伦敦的变化不能用年而只能用周来衡量,"要描述夏天云彩的变化比跟踪伦敦一年又一年的外观还要容易"。[®]英国人在现代城市建设上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溢于言表,如世界上第一座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即"通过工业改造景观成为爱国自豪感的强烈目标"。[®]

嘉庆时期的扬州依旧算是中国的繁华之地,1816年10月8日,阿美士德使团沿着运河乘船从淮安府到达扬州地界。对照工业革命时期迅速发展并富有现代气息的英国城市,清代中国的传统型城市和城镇却逊色了很多,阿美士德使团对清代扬州城市和城镇的印象是色彩灰暗的。

一,扬州境内的城市和城镇古老而缺少现代文明气息。邵伯位于里运河和盐邵河交汇处,是京杭运河线上遐迩闻名的繁华商埠。10月10日中午,使团抵达邵伯,"这是一个散乱地延伸了很远的村庄,其中一部分有一些冲洗得很白的两层楼房,这些房子和那些烟囱让我们想起了许多欧洲的城镇"。^⑤当晚,使团到达扬州城外,"在这一个小时的航行中,值得一提的建筑就是海关监督或者是税吏的房子和另外一处由许多柱子支撑着、灯火通明的建筑"。"城郊那种有着烟囱的两层楼房,在这个省的这一地区比较常见。"[®]10月16日,阿美士德使团成员进人瓜洲城内参观,"河上横跨着一些单拱桥,除了一座外,其余的都是石桥,有的桥侧面装饰着一些还算说得过去的雕刻"。^⑥

二,扬州境内的城市和城镇已呈现破败之相。马可·波罗形容宝应是"美城",[®]而埃利斯眼中的宝应,"它有一定的规模,但庙宇和公共建筑看上去已经年久失修了"。[®] 扬州园林建设兴盛于乾隆时期,为迎合乾隆六次南巡,盐商纷纷修建园林,"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 清代扬州与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并称为"士大夫必游"的天下五大都会,同为全国最重要的文化中心城市。[®] 但在乾隆之后很多园林荒废了。1787年,钱泳初来扬州,扬州园林"楼台掩映,朱碧鲜新,宛人赵千里仙山楼阁中"。1817年,钱泳再游扬州时,沮丧地发现扬州很多园林"今隔三十余年,几成瓦砾场,非复旧时光景矣"。[®] 埃利斯和阿裨尔在日志中也留下了相似的记载。五园曾是乾隆皇帝喜爱的一处行宫,阿裨尔记载了五园的破败:"如今这些建筑一派坍圮荒废。屋顶塌了,窗棂和地板已经破烂不堪。"[®]瓜洲留给马可·波罗的印象是南粮北运之要津,非常繁华。埃利斯对瓜洲的印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5页。

² E. Royston Pike, Human Documen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London; Allen&Unwin, 1966, p. 308.

③ 保罗·雷德曼:《传奇的风景:景观与英国民族认同的形成》,卢超译,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220 页。

④ W.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梅雪芹、刘梦霏译,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第 223 页。

⁽⁵⁾ H. C. Darby ed., A New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fter 16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63.

⑥ 保罗·雷德曼:《传奇的风景:景观与英国民族认同的形成》,第216页。

⑦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1页。

⑧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2页。

⑨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7页。

⑩ 《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81 页。

⑩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0页。

⑫ 袁枚著,顾学颉点校《随园诗话》卷6第87条,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③ 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卷6《郭匡山广陵赠言序》,中华书局1962版,第459页。

④ 钱泳著,张伟点校《履园丛话》第20卷,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33页。

⑤ 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第159页。

却是"从城墙状况和城对面一片荒凉的情况来看,我感觉它都快要被遗弃了"。[©] 阿裨尔也发出相似的慨叹:"瓜洲镇无法满足我心目中对它盛时的期望。镇中的街道看不出任何富裕的迹象,城墙坍塌一片。"[©]

辉煌的城市建设是英国人自豪感和优越感产生的根源之一,也成为阿美士德使团评价传统中国的对照。加之阿美士德使团在扬州停留的时间很短,考察的地方有限,对扬州的印象既浮于表面,也带有主观偏见的成分。但阿美士德使团对扬州城市的印象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18世纪的扬州城市化程度较高,"扬州在18世纪成长为当时最美丽、最具文化创造力和社会活力的城市之一",[®]城市的繁荣也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但"1800年前后,扬州的成长停止了下来"。[®]

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是欧洲中世纪商业化的城市共和国,因控制地中海国际贸易路线而富可敌国,素有"海上商业帝国"之称。马可·波罗出生于威尼斯的商业世家,因此他常常从商人的眼光和兴趣出发,重点审视元代中国的物产、城市和工商业活动,特别对商业活动大书特书。元代的扬州是江淮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马可·波罗明智地选择了这座中国城市。即使在那个时候,扬州在中国形象中的地位,依然可以跟欧洲人后来心目中威尼斯的地位相提并论"。⑤因此马可·波罗行记对元代扬州城市印象的基调是亮丽的。

一,工商业发达是元初扬州留给马可·波罗的第一印象。宝应、泰州是小城,"特商工为活";高邮、扬州是大城,"特工商为活"。[®] 二,"扬州是鱼盐辐辏之地",[©]物产丰饶是元初扬州留给马可·波罗的第二印象。宝应的丝织业特别是民间刺绣历史悠久,高邮的水产和野味十分丰富,泰州和真州的制盐业冠于全国。宝应"有丝甚饶,用织金锦丝绢,种类多而且美,凡生活必需之物皆甚丰饶"。[®] 高邮"产鱼过度,野味中之鸟兽亦夥"。[®] 元朝高度重视两淮盐政,两淮盐的产量冠居全国。泰州"自海至于此城,在在制盐甚夥,盖其地有最良之盐池也"。作为淮盐集散地的元代真州是全国三个特大商业城镇(中统钞万锭以上)之一,[®]马可·波罗便记载真州"城甚大,出盐可供全州之食,大汗收入之巨,其数不可思议,非亲见者未能信也"。[®] 三,战略地位重要是元初扬州留给马可·波罗的第三印象。马可·波罗为官时的扬州城为江淮行省治所驻地,元朝的防卫主要依靠骑兵的大量使用,而非城堡,在江淮地区尤为如此。因此扬州城"制造骑尉战士之武装甚多,盖在此城及其附近属地之中,驻有君主之戍兵甚众也"。[®] 位于扬州最南端的瓜洲处于运河与长江的衔接处,在历史上的知名度仅次于扬州,是南粮北运大都的咽喉之地,非常繁华,"此城屯聚有谷稻甚多,预备运往汗八里城以作大汗朝廷之用,盖朝中必需之谷,乃自此地用船由川湖运输,不由海道"。[®]

二 有关宗教信仰的描述

扬州是佛教在中土传播较早和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扬州境内佛教寺庙林立,寺塔高耸,是佛教兴盛的外在体现。佛教寺庙往往是一个地方最好最大的建筑,佛塔也是一个地方的天际线。英

.91 .

①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7页。

② 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第159页。

③ 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李霞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89页。

④ 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第14页。

⑤ 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第3页。

⑥ 《马可波罗行记》,第281—282页。

⑦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192 页。

⑧ 《马可波罗行记》,第281页。

⑨ 《马可波罗行记》,第282页。

⑩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第214—215页。

⑩ 《马可波罗行记》,第283页。

⑫ 《马可波罗行记》,第284页。

⑬ 《马可波罗行记》,第292页。

国是基督教国家,城乡生活以宗教生活为中心,遍布城乡的基督教堂往往是城乡的中心和最好的建 筑,直插云天的哥特式教堂的尖塔如同佛塔一样亦是一个地方的天际线,十分醒目。阿美士德使团 成员对佛寺和佛塔非常感兴趣,到了逢见必去的地步,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埃利斯的日志中提到 宝应县城内年久失修的庙宇,埃利斯和阿裨尔都提到了高邮的宝塔和寺庙,"这座庙宇专门供奉冥 界十王,由十个大殿组成,每一名冥王掌管一座大殿,周围围绕着用泥土塑成的魔鬼形象的判官,这 些判官被涂上各种颜色,面目被扭曲成狰狞的模样"。 埃利斯的日志提到了扬州的宝塔,"对面岸 上矗立着扬州府的塔楼或者宝塔,塔有7层高,和临清宝塔的比例差不太多"。②高旻寺曾是康熙乾 隆的行宫,与镇江金山寺、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合称为中国佛教禅宗的四大丛林。高旻寺给埃 斯利和阿裨尔都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座庙里祭祀的是佛,有3座巨大的佛的坐像,代表着这个神的 3 种形式。现在佛占据中央的位置,头上戴着头巾,而另外两尊佛像有所不同,头上戴的是一种类 似王冠的东西。佛像前面安放着一块匾,上面刻着祈求皇帝福寿永享的文字。" \$10 月 11 日,埃斯 利等人还登上了高旻寺塔,"塔有7层,塔身的比例看上去不太舒服,和底座相比,它的高度似乎不 够"。 10月12日,埃利斯参观了高旻寺驻地附近的一座寺庙。 10月13日,使团中的两个人参观 了普灵寺庙,"从大殿的规模和厨房器具来判断,我感觉住在庙里的人可能很多。神像比我以前见 过的都要大,这里的三尊佛的头饰没有什么区别"。⑤ 10月19日,使团乘船从瓜洲驶入扬子江,在 仪征县境内扬子江畔见到了名叫"铁孤山"的寺庙。◎

在游览佛教信仰的外在形式——庙和塔之外,对照西方基督教一神教及信仰情况,埃利斯等人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颇有微词。他们认为,寺庙建筑很壮观很普及,而人们却缺少信仰,字里行间隐含着英国人在宗教信仰上的优越感。10月15日,在瓜洲城外旁观当地人在风神庙和海神庙祭祀时,埃利斯写道:"中国人的神话过分地取决于纯粹的地方性,很难把不同的崇拜对象囊括在一个总体系内——一个可以对所有崇拜对象加以解释的总体系。他们从印度引入了佛教及其梵语名词,但是我感觉他们既没有理解它们的意义,也没有理解这个信仰的原则。"^⑤

中世纪是西欧基督教文明发展的盛期,1271年马可·波罗和父亲、叔叔奉教皇格里高利一世之命,送信给忽必烈。忽必烈对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等都采取包容、友好的态度,[®]忽必烈的后人继承了他的宗教宽容政策,从而使各种宗教迅速发展。[®] 佛教最受忽必烈的青睐,而作为基督徒的马可·波罗却得到了大汗的重用,忽必烈曾委派马可·波罗出巡中国多地,其足迹涉及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也曾出使越南、缅甸、苏门答腊等地。忽必烈的宗教政策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作为基督徒的马可·波罗能以平实的笔触记载了扬州人的佛教信仰情况,"居民是偶像教徒(即佛教徒——笔者注)"。[®]宝应、高邮、泰州、真州、扬州、瓜洲留给马可·波罗的印象略有差异,关注点有所不同,而工商业繁荣和佛教昌行是留给马可·波罗共同而深刻的记忆。

三 有关运河的描述

大运河和食盐专卖是扬州财富的两大来源。经元朝"弃弓走弦"后的京杭大运河更方便了漕粮

① 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第158页。

②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2页。

③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2页。

④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3页。

⑤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5页。

⑥ 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第162页。

⑦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7页。

⑧ 《马可波罗行记》,第152—154页。

⑨ 龙达瑞:《〈马可波罗行纪〉中所涉及的宗教问题研究》,《宗教学研究》1990年第3期。

⑩ 《马可波罗行记》,第281—284页。

^{. 92 .}

的运输,成为明清时期南北交通和经济交往的大动脉,清代大运河的地位和利用效率远高于元朝初期,扬州因大运河而变得极为重要,给阿美士德使团留下了深刻印象。1. 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大运河对于扬州南北的城市化的意义非常明显。"①埃利斯、阿裨尔的日志都记载了因运河而兴的城市和城镇,如宝应县、界首驿、高邮州、邵伯镇、扬州府、瓜洲镇等。2. 服务于运河的设施。在大运河千里河道上设置了大量的闸、坝、堰、堤防等设施。阿美士德使团在高邮经过了一座双重水闸,②阿裨尔对水闸的作用很感兴趣,"运河穿过两省地势最低的地区,通过修筑无数的水闸,连通周围的水域,使它们或多或少能有助于实现人们的目的"。③埃利斯记载运河河堤,"堤岸笔直,部分堤岸表面砌着石头",从界首到高邮的途中看到了"堤岸有结实的木桩作为支撑",从高邮到邵伯途中经常看到表面砌着石头的河堤,邵伯的运河河堤很陡峭。④作为博物学家的阿裨尔更关注运河河堤上的动植物情况,"在堤岸上还发现了相当多的螺壳",⑤"堤岸上长满了可以用作燃料的高高的灯心草"。⑥3. 阿美士德使团日志还记载了运河水系上的桥梁情况,这些桥梁有木桥和石桥,多为单拱桥。

英国运河兴盛于工业革命时期,运河被称为"工业革命的动脉",[®]主要用于运输煤、棉花、铁等大宗物资。中国的大运河是农耕社会和大一统国家的产物,而英国的运河是工业社会和资本化的产物,英国运河开凿的技术起点更高。英国人运用当时最先进的工业技术手段,除修建水闸、蓄水池外,还在高地和山地上打隧道,在峡谷间架设铁制水道桥,英国一跃成为世界上运河开凿技术最先进的国家。科技发展水平高是英国人优越感产生的又一根源,也是阿美士德使团评价传统中国文明程度高低的又一参照。清代的闭关锁国、思想钳制等政策导致中国在科技上的停滞与落后,马戛尔尼就曾批判乾隆皇帝对西方的科学技术毫无兴趣,阿美士德对嘉庆皇帝的批评更为尖锐。阿美士德使华时的英国,工业革命深入发展,与嘉庆时代的中国在经济、科技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此时英国运河开凿技术也更趋成熟。在瓜洲,阿美士德使团终止了沿运河的航行,阿裨尔以英国运河开凿技术为参照,认为对大运河的评价不宜过高,"这条沟通帝国两大部分交通往来的著名水道,被认为是凝聚了辛劳的不朽之举,在我看来,如果看作是人类劳作和人类技术巨大力量的典范,似乎有些评价过高了。""水闸使运河保持必需的水位,这些水闸的结构都十分简陋:由石块砌成拱墙,拱墙一侧的凹槽固定厚木板,这就是大运河仅有的一种闸门。大运河既没有穿过任何山脉,也没有流过任何峡谷。"®中英运河的修建存在时代的差异性,以今非古的评价贬低了大运河的修建水平。

工业革命时期,在蒸汽轮船使用之前,英国多数运河主要通过马匹拖曳的方式来行船,运河边都修有马道,大大节省了人力。人力依旧是明清时期生产生活中的基本动力,比前代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代在运河两岸形成了数量庞大的纤夫群体,运河岸边修有纤道,"每条较大的船有 20 到 25 名纤夫,稍小点的船 12 名,更小的船 7 名"。[®] 运河纤夫分为官派纤夫和以拉纤为生的"短纤",运河纤夫的工作十分艰辛,埃利斯写道:"纤夫们的工作一般都不少于 16 小时,在这期间他们从不停下来吃饭或者休息,尽管他们中间有相当数量的老人和孩子。"[®]到达高邮时,阿美士德使团成员在冥界十王庙里发现了二三百个被征召来拉纤(指官派纤夫)的"可怜的不幸之人"。[®] 从瓜洲到仪

① 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第3页。

②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1页。

③ 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第 160—161 页。

④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1页。

⑤ 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第161页。

⑥ 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第161页。

⁷ Charles Hadfield, British Canals: An Illustrated History, London: Phonexis Press, 1950, p. 79.

⑧ 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第160页。

⑨ 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中的动力问题——与中世纪中后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的比较研究》,《浙江学刊》1986年第4期。

⑩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45页。

⑩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68页。

⑫ 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第158页。

征,"我们昨天走了16 英里,船上的船夫和为数不多的纤夫都累得不轻"。[©]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交通变革将文明推进到"荒凉的地方",[©]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英国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这也成为阿美士德使团评价中国的又一参照。阿美士德使团和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对中国人的评价都很差,而运河纤夫给他们留下了更糟糕的印象。埃利斯写道:"但是纤夫们的样子就不同了,他们真是我们人类的垃圾,形象难看,一脸病态,憔悴消瘦,衣衫褴褛,既让人同情又让人心生厌恶。"[®]1793 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时,运河上的官派纤夫也给他们留下了糟糕的印象:"他们大多是老弱病残,有的瘦里巴干、面带病容、衣着褴褛,一群人看来应上医院就医,而不应去干苦活。"[®]在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眼中纤夫的劳动是辛苦和不人道的,而民生多艰则是中国经济社会停滞的又一结果。

元朝的南粮北运存在河运与海运两条航线,元初的运河一方面因水源不稳定导致河道时患浅滩,船只不胜重载,故元初南粮北运仍以海运为主;另一方面,在1282年马可·波罗来到扬州前,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等重要河道尚未开凿,隋朝时期开掘的运河部分河道因年久淤塞未加清理而处于废弃状态,因此元初的运河很不完善,运河的重要性尚不凸显,表现为马可·波罗对扬州境内运河的记载着墨不多,但有限的记载也不缺赞美之辞。马可·波罗在古运河沿线旅行的主要交通方式是骑马,从淮安沿着运河河堤骑行一日到宝应,"此堤用美石建筑,在蛮子地界人境之处"。⑤

四 有关乡村景色和农家生活的描述

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被称为"快乐的英格兰",优美的田园环境是"快乐"的一大缘由。18世纪50年代开始的英国工业革命对乡村景观造成了严重破坏。[®] 英国著名学者钱伯斯(J. D. Chambers)认为"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就是棉纺织业的发展过程",[®]棉纺织工业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先驱和"皇后"。18世纪70年代以来,因动力(水力)在棉纺织业、毛纺织业和炼铁业中的普及,乡村面貌开始发生大规模变化。[®] 水力纺纱机工厂往往建在乡村的河流边上,生产的棉织品越多,排放到河流中的污水就越多,河水开始变黑变臭。"在意图丑化令人陶醉的景色方面,再没有什么能胜过棉纺织厂了;如果要为丑陋颁奖的话,由经济催生的这种天才的发明绝对会拔得头筹。"[®]在蒸汽动力被普遍应用(19世纪早期)之后,英国城乡景观达到了极其恐怖的地步。[®] "一个山静林幽、碧水蓝天的农业一乡村社会逐渐变成了嘈杂纷扰、烟囱林立的工业—城市世界。"[®]大气、河流被污染,森林被大面积砍伐,时至今日,英国的郊外依旧树少草多。总之,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变了英国的乡村景观,激起了保守的英国人对平静生活的向往。远离城市的喧嚣、享受乡村的宁静,也是传统贵族因袭久远的生活方式。英国人浓郁的"乡村情结"是与生俱来的,"无论以后如何发展,英国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过程由于内涵丰富,因而值得铭记。尽管经历了这一转变过程,英国人对乡村的态度,以及对乡村生活的态度,却一直不变,其韧性不同凡响"。[®]

①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203-2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00页。

③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73页。

④ 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泽,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436 页。

⑤ 《马可波罗行记》,第281页。

⑥ 保罗·雷德曼:《传奇的风景:景观与英国民族认同的形成》,引言第 xix 页。

T. D. Chambers,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British Economic History from 1820—188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3.

⑧ W.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216页。

⑨ W.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223页。

⑩ W. G. 霍斯金斯:《英格兰景观的形成》,第226页。

⑩ 梅雪芹:《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城市大气污染及防治措施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⑫ 雷蒙·威廉斯:《乡村与城市》,韩小满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2 页。

^{• 94 •}

乡村田园主义"一直渗透在英格兰文化中,真正影响着英格兰精英和普通大众们的态度"。^① 同工业革命时代风光不再的英国乡村相比,扬州乡村景观的自然之美令阿美士德使团神往,"田园牧歌"式的农家生活亦让阿美士德使团难忘。

阿美士德使团详细记载了沿途所看到的乡村景色。10月9日,埃利斯等人在宝应境内运河右岸看到了一大片自然景色甚是激动,"说实话,看到这一片原始的大自然,我十分高兴,因为多少天来,用句爱尔兰话说,没有什么东西是自然的"。² 10月11日,埃利斯等人登上了高旻寺塔,乡村的美丽景色令埃利斯等人赞叹不已:"这里的景色可以看作是中国景色的美丽样本。四面八方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尽管只是部分灌溉但仍然不失肥沃的农田,田野里星星点点的树木和灌木丛。"⁸ 扬州是鱼米之乡,盛产鱼虾、螺蛳、莲子、菱角、荸荠等,阿美士德使团成员对此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与欧洲的农产品进行对照。⁸

阿美士德使团日志还详细记载了鱼鹰抓鱼、农民采莲等农家生活场景。10月9日下午,在界首,埃利斯等人饶有兴趣地欣赏了鱼鹰捕鱼的场景:"每条船上的木柱上都有几只这种鸟,它们从柱子上飞入水中。这些鸟潜水自然是为了捉鱼,同时它们已经被训练得能够把鱼带回到船上。我看到一只鸟的喉咙处有一个硬项圈,以防止它把鱼吞进肚里。好像是通过敲击木柱来让它们潜入水中。"^⑤10月12日,埃利斯等人参观高旻寺附近的另一座寺庙:"在返回船队的路上,我在一条水沟前停了下来,观看一个人乘坐着一只柳条篮子采集睡莲的种子。……他以手为桨,由于篮子就像一条小船,所以他在水中行走并不费力。"^⑥

磨坊是加工粮食的必备工具,而水车是灌溉农田的重要工具。埃利斯在日志中详实记载了扬州人使用磨坊和水车的场景:"里面有一个脱壳用的磨,磨石斜放着,两块磨盘的表面都呈锯齿状,上面一块是圆柱型的。有一个轮子用来清扫粮食,还有一些扇子用来吹开糠皮。"[©]"这里普遍使用机械灌溉稻田,这种机械由一个水平大轮子和一些突起的把柄组成,在这些把柄上用力,其作用就像嵌轮一样。轮子上安有一个轮轴,两头各有一个小轮子,一个小轮子上有一些小滚轮咬住大轮子上的嵌齿,另一个小轮子上安有一些嵌齿。"[®]

作为商人的马可·波罗对扬州境内城市和工商业的记载颇多,却不太关注扬州境内的乡村景 色和农家生活。

结 语

观察者对他国的印象及观念的生成往往会从其所处的时代和所在国的国情出发,并与个人的经历相结合。阿美士德使团对清代中国的贬损、马可·波罗对元代中国的溢美未必等于客观事实,是二者所处的时代、所在国的国情和个人经历差异性的产物,而不同的中国观又对中国和世界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东南三大政,曰漕,曰盐,曰河。广陵本盐策要区,北距河、淮,乃转输之咽喉,实兼三者之难, 其视江南北他郡雄踞八十年中。"[®]清代扬州地区得益于运河、漕运和两淮盐政之利,商品经济非常

① 保罗·雷德曼:《传奇的风景:景观与英国民族认同的形成》,引言第 xix 页。

②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1页。

③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3页。

④ 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1816—1817)——阿美士德使团医官笔下的清代中国》,第161页。

⑤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1页。

⑥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4页。

⑦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4页。

⑧ 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第194—195页。

⑨ 《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德序》,《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41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第2页。

《史林》5/2023

发达,两淮盐商供给全国四分之一人口的食盐需要,[©]富甲天下,在乾嘉时期,山西、陕西和徽州商人 云集扬州, 蓄资计七八千万两白银。②清代扬州地区依旧是中国的繁华之地。扬州人阮元认为, "扬 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间。……方翠华南幸,楼台、画舫十里不断"。③袁枚在给《扬州画舫录》作 序时写道:"本朝运际中天,万象隆富,而扬州一郡,又为风尚华离之所。" @但自 19 世纪以来,扬州已 呈颓败之势,开始从一个全国性文化中心城市跌落为地区性文化中心城市,其城市地位也同步下 降。⑤ 阮元在给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做二跋时慨叹家乡扬州的衰落之快:"嘉庆八年(1803),过扬 与旧友为平山之会。此后渐衰,楼台倾毁,花木凋零","近十余年,闻荒废更盛"。 乾嘉时人梁章 钜写道:"扬州耆旧如晨星,提唱风雅者绝无人,而鉴藏书画之风亦久阒寂。"◎运河、城市、寺庙、乡村 景色和农家生活构成阿美士德使团"扬州印象"的四大内容,阿美士德使团以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 为映射,除对扬州美丽的乡村景色和古朴的农家生活的感受较为正面外,对城市、运河、宗教信仰的 评价都有负面之处,总的来说阿美士德使团对清代发达地区——扬州印象的基调是灰暗的。"在关 于中国社会的粗略图像中,它(指扬州)正好可以作为这些进程的标准案例。"®从对扬州印象可以 管窥阿美士德使团成员的中国观:同工业革命时代快速发展的英国相比,古老的中国文明已处于停 滞和落后状态。工业革命极大地推动了英国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以现代文明为参照系,清代中国 已经与现代文明渐行渐远,变成了"半野蛮民族"。》这些认识既有中肯的地方,也存在贬损之处,将 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西方社会与东方社会对立起来,夸大中英两国的差距。英国人对付世界的方 法直接反映了当时英国人对世界的认识。⑩ 阿美士德使团的中国观进一步改变了英国的对华政策, 加快了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进程。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便切断了扬州通往北京的运河命脉,"瓜 州仪征所有盐舶商舟,焚烧殆尽"。⑩

元代的扬州一直是江淮地区的行政和经济中心,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厚的渔盐之利再度走向繁荣。忽必烈时期的中国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扬州地区是中国的发达地区,马可·波罗以商业文明为视角,对扬州地区的印象基调是亮丽的。从扬州印象可以管窥马可·波罗的中国观:中国文明处于较快发展的状态。品读阿美士德使团的日志也可发现马可·波罗行记对他们的影响之深。《马可波罗行记》是中西方非经济联系和直接交往的较早例证,"为西方人对完全是另一个世界的含浑、笼统的了解提供了一线光芒"。《马可波罗行记》激起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神往,掀起了西方航海家、探险家、旅行家探索东方的热潮,推动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博弈视阈下中国大运河国际形象提升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18BGJ08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杜 倩)

① 何炳棣:《扬州盐商:十八世纪中国商业资本的研究》,巫仁恕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② 汪喜孙:《从政录》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18页。

③ 李斗著,陈文和点校《扬州画舫录》,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229页。

④ 李斗著,陈文和点校《扬州画舫录》,第1页。

⑤ 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导言第9页。

⑥ 李斗著,陈文和点校《扬州画舫录》,第229页。

⑦ 梁章钜著,吴蒙点校《浪迹丛谈》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31页。

⑧ 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第6页。

⁹ J. L. Cranmer-Byng ed.,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c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62, p. 222.

① P. J. Marshall, G. Williams, The Great Map of Mankind; British Perceptions of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London; Dent, 1982, p. 3.

⑩ 梁廷枏著,邵循正点校《夷氛闻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7—118页。

② 中国国际文化书院:《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马可·波罗》,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223 页。

《史林》5/2023

It concludes tha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is temple in four hundred years was a true picture of the development of Buddhist monastery in Nanjing and an embodiment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culture of Nanjing.

Yinwo Trade, Yangzhou Salt Merchants, and Capital Market in Early and Mid-Qing

HUANG Kaikai

The present paper, reexamining the history of Yangzhou's trade of *yinwo* (the basic unit of official salt-transport permit issued to a specific region), in which the speculations grew almost unchecked since Yongzheng reign and there were even traders who speculated in the official permit only and never transported salt, concludes that the wild opportunistic practice finally led to Emperor Qianlong's strict regulation of salt transportation, which directly resulted in the bankruptcy of many Yangzhou salt merchants.

The Pedigree of a Famous Clan and Its Counterfeits in Huizhou: The Case of General Pedigree of Hong Clan in Guanyuan Compiled in Qianlong Reign ZHENG Xiaochun, TAO Liangqin

The present paper, delineating a legal case, in which the Hong clan that was compiling a general pedigree sued a fake Hong clan producing false pedigree and finally won the lawsuit, contends that the reason why people there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pedigree should be attributed the feudal hierarchy of social status and some families' desire to reconstruct their status by grafting themselves onto renowned clans.

Yangzhou in *Diary of Amherst's Diplomatic Corps* and *Travels of Marco Polo*: A Comparative Reading WANG Ting, YONG Zhengjiang

The present paper, digging into *Diary* and *Travels*, in which China was respectively depicted as a stagnant, declined gray pl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ritain growing rapidly sinc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as a bright, well-developed cit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medieval Europe, reveals that both views of China exerted deep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China and the world, even though neither the underestimation and nor the overcompliment of China was factual.

The 1902 School Chart: Dispute between Old and New and Central-Local Interaction

WANG Yafei

The present paper, shedding light on the power conten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local authorities behind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1902 school chart, argues that this new policy should be treated as the extension of the dispute between old and new systems since Hundred Days Reform in 1898. It draws such a conclusion that the dispute between old and new systems and the changed power structure, in which local governors became increasingly powerful, significantly affected new policies.

Morpheus and Awaking Lion: The Handling of Morphine Problem in Late Qing, 1899—1911 MA Weixi

Applying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history, the present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ason why there was \cdot 218 \cdot